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 马克思主义 文艺论著选讲

(第五版)



MAKESIZHUYI  
WENYI LUNZHU XUANJIANG

陆贵山 周忠厚 编著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 马克思主义 文艺论著选讲

(第五版)



MAKESIZHUYI  
WENYI LUNZHU XUANJIANG

陆贵山 周忠厚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陆贵山, 周忠厚编著. —5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3740-7

I. ①马… II. ①陆…②周… III. ①马列著作研究-文艺理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A811. 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8047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五版)**  
陆贵山 周忠厚 编著  
Makesizhuyi Wenyi Lunzhu Xuanjiang

---

<b>出版发行</b>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社 址</b>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b>邮政编码</b>	100080
<b>电 话</b>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b>网 址</b>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b>经 销</b>	新华书店		
<b>印 刷</b>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b>规 格</b>	185 mm×260 mm 16 开本	<b>版 次</b>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5 版
<b>印 张</b>	29 插页 1	<b>印 次</b>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b>字 数</b>	711 000	<b>定 价</b>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第五版序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历史意识、辩证思维、实践观点、批判精神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而独特的学术品格。借鉴西学文论和国学文论的理论资源，提升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经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对发展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不可或缺的。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人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仍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经典文本是常读常新的。由于历史和文化机缘的召唤和触发，可以从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中，发现一些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一方面，应当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优势，把强项做得更强；一方面应当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开拓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中所蕴藏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相对比较薄弱和空疏的理论空间，加以弥补和充实，使其更加充实、完整和系统。

一些中外学者通常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归属为社会历史学派。这种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情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没有关于人学的思想、理论和观点。通过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中拥有丰富、深刻的人学理论和科学、系统的人学思想。梳理和提升这些人学理论和人学思想，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增强、优化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应对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挑战，寻求创新和发展的机遇，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学术使命。萨特曾断言说，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独尊历史，无视人文。这种看法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诚然，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和第一性的原则。但并没有忽略了人，而是把人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里加以考察，认为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社会称为“作为主体的社会”<sup>[1]</sup>。实质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人学理论、史学思想和人学思想、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活动是人的历史活动。人的劳动、实践和生产活动被视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2]</sup>。“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sup>[3]</sup>。“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sup>[4]</sup>。“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五版）

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5]</sup>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人自身的生产”<sup>[6]</sup>。

马克思、恩格斯既重视历史状态，也关注人的生态。当人的观念阻遏历史的发展时，他们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人的生存环境，推动历史转折和社会进步。恩格斯通过评巴尔扎克的创作，列宁通过评托尔斯泰的创作，肯定了从封建农奴制向市民共和制的社会变革，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诸多方面，展现了新兴的市民阶级取代腐朽的贵族阶级的深刻的历史过程。当历史状态和社会情况压抑人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又倡导人文精神，提振人文关怀，反对现实生活中的鄙俗气。他们满腔热忱地赞美和讴歌文艺复兴时代焕发出来的健全的和高昂的人文精神，对当时他们的祖国——德国的人文精神的低迷感到焦灼和忧虑。恩格斯说：“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sup>[7]</sup>“黑格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sup>[8]</sup>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复古主义。他们抵制“用真正的田园诗的笔调”，“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sup>[9]</sup>。他们反对社会变革风暴即将来临时，“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sup>[10]</sup>。恩格斯还反对掩盖和遮蔽社会矛盾的虚假意识，在《反杜林论》中尖锐批判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社会弊病的和谐派。只有新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才能为新人提供生存和发展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的解放问题。他们把人的解放问题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运动。他们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sup>[11]</sup>可见，人的解放问题不是靠语言修辞和审美救赎所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对克利盖等人主张的“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sup>[12]</sup>，“用他那爱的纸炮吓唬”<sup>[13]</sup>和征服人们，“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sup>[14]</sup>。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理论，包括语言所承载和叙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论断是特别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强调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的重要性。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是达到预期目的和实现变革蓝图的必要前提，好比过河的船只和航行的灯塔，恰如率军的旗帜和进军的路标。但理论必须付诸实践。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产生和实现真理的唯一途径。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和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理论和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东西。只有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的物化形态，落实和兑现了的理论和思想才是具有实效性的，否则只能停留在人们的思维中和幻想里。语言承载着的理论和思想所蕴涵的意义、价值与作用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关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前途，有的则非常低微。即便是高超的理论和思想，也必须或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挣脱、游离和超越人们的思维、心理和幻想的层面，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人类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转折和社会的进步都不是说出来的和唱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的伟大成果。马克思曾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

更重要。因为，新事物和新人物的诞生并不取决于理论本身的自我繁衍。“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sup>[15]</sup>妄图通过审美乌托邦和审美救赎的理论来实现人的解放问题，只不过是“被压抑又耽于幻想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浪漫之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认为这是幻想”<sup>[16]</sup>。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内部规律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内部规律的论述是不多见的和相对薄弱的。正因为如此，更应当从经典文本中挖掘和发现关于艺术的内部规律的理论 and 思想。不应当把内部规律的研究领域，视为形式主义的专利和禁区。形式主义对内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有价值的成果，同样是文论家应当珍惜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文化遗产。承接和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丰富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内部规律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只有梳理、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内部规律的理论，才能有效地应对形式主义的膨胀、弥漫和挑战。应当承认，艺术是具有内部的结构和因素的，是存在着内部规律的。矛盾分为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打仗分为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事物发展和演变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实质上，艺术的外部规律即是艺术的外因，艺术的内部规律即是艺术的内因。一位中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曾把艺术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恰切地比喻为地球的公转和自转的关系，颇有启发性。一方面应当尊重文论家们研究形式语言符号等特殊的内部规律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一方面也要防止和克服强调艺术的普遍的外部规律时，忽视对艺术的特殊的内部规律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理解和阐发艺术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相互关系。

关于形式和内容的理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关系。经典文本中关于内容和形式的主要观点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同时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内容是相对稳定的，而形式却是相对活跃的。新内容可以利用旧形式，新形式也可以表现旧内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复杂的，但两者之间的基本规定是不可随意消解、颠倒和互易其位的。即便是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尽管审美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这种特殊规律应当是对普遍规律的丰富和补充，而不应当是对普遍规律的否定和颠覆。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中，内容起着主导的、制约的乃至决定的作用。即便是一些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也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形式和内容的一般性的理论原则。詹姆逊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 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一书。他所倡导的“辩证的文学理论”强调作品本身的辩证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形式与内容的适应性和社会历史因素对构成形式的根源性。他认为，形式作为与内容相对应的“深层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符号”，实际上是内容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完成。形式主义的探索，深化和细化了对文学形式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对文学的外形式和内形式的理论空间。有选择地批判地吸取这些成果，对发展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理论是有益的。但有些形式主义的理论却极端地夸大了形式对内容的改制和重组的作用。完全脱离内容的形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至于“内容是完成了的形式”和“内容是有意义的形式”等界说，在肯定形式组构作用的同时，也不可能排除“内容的意味”。诚然，在反作用的意义上，可以适度强调形式对内容的征服。席勒为了追



求人的“审美自由”，曾在他的《美育书简》中表达和抒发“靠形式完成一切”的奢望。受到康德和席勒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学，都无限度地夸大了文本、形式和语言的作用，使作品中的内容被淡化和弱化，同时泛化和强化了主体的随意性，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客体的先在性和对创作的制约性。

关于文本和语言的理论。语言本来是人的语言，本来是人的世界的语言。西方的“语言学转向”，尽管深化和细化了对语言的研究，但又极端地夸大了语言的功能，实质上把语言与人的关系和语言与人的世界的关系搞颠倒了。人和人的世界作为存在不是语言的家，反而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不是人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人。实质上把语言推崇为决定人和人的世界的神，发展了又片面地、极端地、无限度地夸大了语言的地位和作用。

西方现当代一些具有变革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左翼人文知识分子，把对现实的变革转化为对语言的变革。幻想通过语言变革实现现实变革。他们的动机可能是真诚的，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则是软弱的，或许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组织意识舆论和社会心理的作用，但却是极其有限的。“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60年代“六月革命风暴”失败的产物。正如伊格尔顿等人所指出的，“语言学转向”是出于对现存的牢固的体制和政权的恐惧与怯懦所产生的向语言领域的转移和退却，也可以说是躲避和逃逸。有些语言学家的学术策略是通过修辞学从事语言改革，实现社会变革。这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词句革命论”。阐释学的人文语言革命极端地夸大了语言的功能和作用。语言重组和文本颠覆并不能直接作用于生活，并不意味着对实在的现实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语言和文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有边界的和有限度的。语言在文本中所经历的命运，从陷入“文字游戏”到打破“语言的牢笼”，都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不是语言决定现实，而是现实决定语言。语言和“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包括语言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都是人们的物质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产物。精神生产中的语言，又是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人们的生产，包括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sup>[17]</sup>。不能把语言的生产和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仅仅局限在和归结为语言和词句本身的封闭的自我增殖、自我繁衍。马克思、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sup>[18]</sup>。语言总会受到现实生活的“纠缠”，“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sup>[19]</sup>。用语言变革代替现实生活的变革，“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整个问题，只存在于哲学幻想中”<sup>[20]</sup>。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时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实际上只是通过词句来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sup>[21]</sup>本身。妄想通过对语言词句的主观解释和修辞，打乱和重组语言结构，来改变现实生活中的历史结构和政治结构是不可能的。把语言批判作为反对现实生活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sup>[22]</sup>，“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sup>[23]</sup>。这种语言的变革行为实质上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

‘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sup>[24]</sup>

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发现了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的互文性，企图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带有解构主义意向和批判精神的阐释，对历史文本施加影响，以求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改变现实。这种互文性的理论既把历史和文本联系起来，同时又把历史和文本混为一谈。这种文本的历史观是有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应当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严格地区分开来，反对把用语言和文本承载和包装的“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sup>[25]</sup>。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一些人“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始终非常丰富的幻想和现实等量齐观，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现实的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并且还在继续扮演的可怜的角色。”<sup>[26]</sup>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文学文本不能不受到历史文本的影响和制约。文学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思想矛盾，是由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的。文本结构非但无法超越和摆脱历史结构，反而是历史结构在文本结构中的投影和折光。正如恩格斯评论伟大诗人歌德的思想结构和文本结构时指出的：“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sup>[27]</sup>。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中的这些思想，对正确分析和评价形式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我们注意到，局限于对文本和语言层面的再创造中，只体现在各种形态的带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特征的修辞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的批评活动中。相对而言，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对语言本身的重释和重塑并不重要。文艺创作的基本问题是考虑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创作的基本问题，反而被悬置或抛弃了。各式各样的批评理论，如修辞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对文艺创作本身的意义十分有限，与之多所隔膜。研究人物塑造问题，仍然是文艺创作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特别是关于新人形象塑造或塑造新人形象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思想是：倡导塑造新人形象是一脉相承的，从呼吁塑造“革命的和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到反映“新事物”，到“表现新人物，新的世界”，到塑造现代化事业中的“创业者”和“新人形象”；坚持塑造人物形象的唯物辩证法，强调社会历史环境对人物形象的制约作用，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28]</sup>；明确区别“新人”和“旧人”的首要标志是能否“改变这种环境”<sup>[29]</sup>；新人形象是具有变革意识和“实践力量的人”<sup>[30]</sup>；只有以新人形象作为新的历史使命的承载者，才能从正面体现出新的思想体系和核心的价值体系。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美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从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联系中提倡美学精神的，是从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的联系中提倡美学观点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是有机地融为一体的。

美和美感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人的劳动创造了属人的世界，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属人的世界的美和人本身的美。“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五版)

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sup>[31]</sup>。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对“美的规律”的阐释,尽管各有不同,但“两个尺度”对美的存在和创造,都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审美特性不同于物质属性和商品属性,是一种特殊的与人相关的价值属性。“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sup>[32]</sup>。“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sup>[33]</sup>审美感觉表现为一种富有个性的情感、激情和爱憎态度。

美学的基本问题是审美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审美关系的论述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强调美的唯物论,认为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主张艺术和艺术美是现实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同时又超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论断,特别强调美的辩证法,力倡艺术美应当比生活美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即便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也并没有忽视对文艺创作的审美品位的要求。

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是审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抵制黑格尔的“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sup>[34]</sup>。反对“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sup>[35]</sup>。马克思非常强调审美主客体的关系的“规定性”。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sup>[36]</sup>马克思反对“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像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不在任何地方渗入现实的内容,甚至“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sup>[37]</sup>。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这种规定性”不能理解为抽象的和想象的“规定性”,而是主客体之间,即“对象的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关系的规定性。“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这种关系的规定性不可能是完全均衡的,如向客体方面倾斜,形成现实主义一类创作和作品,如向主体方面倾斜,形成浪漫主义一类创作和作品。马克思、恩格斯是侧重于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作品的。

反映在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遵循客观对象的逻辑来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不认同像欧仁·苏书中的人物那样,“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sup>[38]</sup>。《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形象玛丽花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像太阳和花一样的少女,而欧仁·苏通过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的教义对她进行改造,使她变成有罪意识的奴隶,从“本来的形象”变成“批判的变态”。而当作者“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时,读者“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sup>[39]</sup>。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用批判的原则改制人物和环境,这样做的实质是用“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sup>[40]</sup>。崇拜语言批判的“自我意识”使其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理念”,即“人化了的理念”<sup>[41]</sup>。

反映在对作家艺术家的评价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同样应当遵循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如对伟大诗人歌德的评价,恩格斯反对一些有偏见的评论家只对所谓的“歌德的人的内容”进行片面性的挖掘和夸张性的解释,认为应防止和克服只凸显歌德的所谓的“人的内容”

中那些怯于变革,喜欢宁静、安逸、平庸、亲和,耽于幻想的一面,而故意遮蔽和掩盖歌德伟大的一面,甚至把歌德涂抹得与德国的小市民一模一样。作为阐释者的格律恩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实质上是用“被歪曲了的歌德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狭隘性”<sup>[42]</sup>。

我们坚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在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的基础上,位于时代高端,增强问题意识,倾听实践呼声,一定会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开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新生面。

编著者

2011年3月

### [注 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73、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7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18~219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39页。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311页。
- [12] 同上书，16页。
- [13] 同上书，20页。
- [14] 同上书，3页。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
- [16] 同上书，121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9页。
- [18] 同上书，525页。
- [19] 同上书，34页。
- [20] 同上书，528页。
- [21] 同上书，22~23页。
- [22] 同上书，43页。
- [23] 同上书，45页。
- [24] 同上书，22页。
- [25] 同上书，200页。
- [26] 同上书，551页。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254页。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3页。
- [29] 同上书，234页。



-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4页。
-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6页。
-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245页。
- [35] 同上书，213页。
-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5页。
-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246页。
- [38] 同上书，233页。
- [39] 同上书，215~218页。
- [40] 同上书，174页。
- [41] 同上书，175~176页。
-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275页。



# 第四版序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和文学理论是多样的、丰富多彩的，都有各自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自身思想的先进性质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宏观视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观察和研究文学现象提供了科学的宏阔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思想体系，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探讨带有明显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为全面地完整地考察文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历史意识。**“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sup>[1]</sup>。人类的第一个历史的活动，“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sup>[2]</sup>。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sup>[3]</sup>，要真正地、实际地“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sup>[4]</sup>。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形式都只有把它们置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历史环境里和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辩证思维。**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是观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最灵验的钥匙。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价值、意义和特殊的思维方式，作为相互关涉的系统结构都存在着辩证的联系。所有的理论和概念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sup>[5]</sup>。“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sup>[6]</sup>。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本质实际上都是一种发生着辩证联系的系统存在。一点论、片面性、走极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非此即彼，除此以外，全是鬼话”等线性的运思方式和文学研究过程中屡屡出现的回归现象、轮回现象、钟摆现象和所谓“瞎子摸象”、“坐井观天”、“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思维惰性，均属僵化的刻板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都可能成为妨碍人们全面认识和体验对象世界的理障。恩格斯这样告诫人们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sup>[7]</sup>。为了坚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五版）

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对判定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思维误区，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是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标签、套语和教义的教条主义哲学的思维惰性，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观点

关于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sup>[8]</sup>恩格斯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sup>[9]</sup>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理解文学艺术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它的性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飘浮在精神领域顶端的意识形态形式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并通过一定的中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一般表现为决定和被决定、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还表现为相互适应的关系。恩格斯在晚年特别重视精神、思想、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和交互作用，强调两者的“合力”关系。必须全面地、辩证地把握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决定关系、适应关系和由于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关系”的复杂性质及其表现形态。

关于文学是艺术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的观点。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sup>[10]</sup>这里所说的“具体总体”、“直接

的直观的表象”均指外部世界的感性存在。“思维总体”所体现的“思想具体”，实际上蕴含着掌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思维的理解”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宗教精神”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信仰关系；“实践精神”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意志目的关系；而“艺术精神”则侧重体现人与世界的精神层面的感性的和“直观的表象”的关系。实质上，在体现人与世界的感性和表象关系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也必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抽象思维的作用、信仰、价值取向和达到行为目的的意志。这些因素总是这样那样地联系着，并通过实践协调互动。从思维上对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掌握，首先是“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sup>[11]</sup>。这种思维中的动机、感觉、信仰、意志等等只有通过实践的物化过程，才能使对象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sup>[12]</sup>，成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

关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13]</sup>“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sup>[14]</sup>，同样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所制约。文学作为语言中的精神生产，既有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又有作为一般生产的普遍性，表现为两者的辩证统一。“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经历着“生产者物化”和“所创造的物人化”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sup>[15]</sup>审美主客体交互作用，双向生成。“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sup>[16]</sup>“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sup>[17]</sup>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中，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属于语言艺术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是通过对文学语言的创造来实现的。精神生产虽然受制于物质生产，但与物质生产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两者宏观上是平衡的，微观上是不平衡的。而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如经济落后的19世纪的德国，文学艺术可以表演第一把小提琴。古希腊神话具有恒久的意义和价值，以不可超越的艺术魅力，成为不可企及的范本。

关于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观点。马克思把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生产 and 动物的生产区别开来。他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18]</sup>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生产，不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会不同程度地根据“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不管对两个尺度作何种解释，审美实践的感性的创造活动，都只能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交互作用。因为无客体的主体和无主体的客体的审美实践的感性的创造活动都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进行的。

上述几种观点，都属于意识和精神范畴。关于意识形态形式的论述和关于通过思维艺术地掌握世界的论述属于反映论层面；关于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论述属于实践论层面；关于艺术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论述属于创造论层面。诚然，实践活动和创造活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五版）

动的动机和构思都必然依靠和伴随思维活动。因此，这几种观点实际上都认为意识和精神领域中的认知活动、实践活动和创造活动是相统一的过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 and 实践活动，都必须以对对象的把握为基础。任何一种意识生产和精神生产尽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但都一定程度上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的决定、影响和制约。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质，首先表现为感性和感性的整体性，即马克思所说的通过“直接的直观的表象”呈现出来的“具体总体”。受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规律支配的意识和精神生产，都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有思维指向和预期目的的“感性活动”。应当把感性对象，从主体的能动方面理解为实践的批判的感性活动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所面对的全部“感性世界”不是“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sup>[19]</sup>。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但并没有明确指出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审美往往被界定为感性学，强调审美经验的个体性，一般不表现为纯粹的思维理性，并不承载强烈的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而意识形态则大不相同，它往往是群体、阶级、集团和国家的意志的集中体现，以思想体系和系统观念形态出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政治倾向性。不管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还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意识形态都是如此。

可以从“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感性实践中引申出审美意识的概念。审美创造活动是实现审美意识的实践活动，而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是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审美意识只是一种形态，只是一种“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sup>[20]</sup>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不能直接等同于具有思想体系含义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可以划分为感性形态和理性形态；审美意识一般呈现为感性形态。但也不应该把审美意识完全视为非理性的。美学的原意虽然被界定为感性学，但它追求感性的完善。审美的感性形态不是纯感性的。这种感性积淀着、贮存着理性，审美的实践创造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往往表现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sup>[21]</sup>。感觉蕴含着理性的基质，“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sup>[22]</sup>。因此，感性可以发展为、提升为理性范畴。只有发展和上升为理性范畴的审美意识，才能被称为审美意识形态。

###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恩格斯主张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观察和评价作家和作品，并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视为衡量作家和作品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sup>[23]</sup>。恩格斯这里所讲的虽然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但实际上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提出来的文学观念。因为批评是“运动着的美学”或“实践中的观念”。一定的批评模式总是折射、反射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观念。对文学怎么看，制约着、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对文学怎么评。反过来说，对文学怎么评，确证对文学怎么看。应当强调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观念、原则、方法和标准的互通性和一致性。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既是最高的原则、方法和标准，也是最高的观点。“美学观点”、“史学观点”以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辩证统一和完美融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恩格斯实际上是把文学本质视为审美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的辩证统一。

文学既是社会历史现象，又是审美现象。这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带有审美属性的，或具有审美特质的；这种审美现象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特殊的构成部分，是富有社会历史内涵的。简言之，社会历史现象应当是审美的；审美现象应当是社会历史的。换言之，完全摆脱审美特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和完全剥离社会历史内容的审美现象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文学创作应当追求社会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和谐统一。正如恩格斯所倡导的，文学创作要尽可能地实现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sup>[24]</sup>。这种要求作为一种艺术的理想和戏剧的未来，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的有机统一。

历史是人的历史。从史学观点中，可以自然地引申出人学观点。这样，可以从美学观点、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的结合上，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考察文学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从美学观点看文学，可以彰显文学的审美的本质、功能、价值和意义，以弘扬文学的美学精神。审美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渗透着、蕴含着社会历史的、人文的，乃至自然的、文化的内容并通过这些相关因素表现出来。纯粹的审美主义和纯粹的形式主义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恩格斯从结构、情节、韵律、格言等方面，提出美学要求，主张有卓越的个性刻画，反对垂死的模仿文学的恶劣的个性化，认为作品应当更加莎士比亚化，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从史学观点看文学，可以凸现文学的社会历史的本质、功能、价值和意义，以弘扬文学的历史精神，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考察和研究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契机，追寻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源的根源”和“动力的动力”。恩格斯指出诗人歌德的出现和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是由他所处的当时的德国的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矛盾是俄国的深层的社会矛盾在他的头脑中的投影和射光。任何人都难于摆脱鄙俗的充满历史惰性的社会环境对自身的濡染，即便是像歌德和黑格尔这样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也不例外，他们尽管“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sup>[25]</sup>。文学创作通过审美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应当反映社会生活的状态和风貌，包括真实表现一定的阶级关系和人物关系，正确表现历史结构、社会矛盾、社会运动以及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趋势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的剧作对济金根这个人物形象所围绕的历史状况、社会运动性质和阶级关系，作了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错误描写。《济金根》把悲剧的主人公这个本来是一个“在统一和自由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的“垂死阶级的代表”，描写为实现德国统一的民族英雄，冲淡和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市民阶级应有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的历史作用。

从人学观点看文学，可以突出强调文学的人文的本质、功能、价值和意义，以弘扬文学的人文精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26]</sup>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守和重塑当代的人文精神，对提高文学创作的人文品位、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 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价值取向

反映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称颂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赞扬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和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国和俄国从宗法制农村公社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史进步过程给予了极高评价。正是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反映了“翻了一个身”的那个时代的经济结构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革、社会关系的转变、思想文化的更新等一系列的重大的社会事件和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市民社会取代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历史变革，一方面对妄图倒退到田园式农村公社的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潮进行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是我们所不取的”<sup>[27]</sup>。马克思批评那些诅咒历史前进的人“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sup>[28]</sup>的“田园诗人”。他们反对“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sup>[29]</sup>。马克思、恩格斯厌恶把历史人性化、情感化和道德化的倾向，反对一些政治势力“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sup>[30]</sup>。他们对宗法制农村公社阻碍历史进步的负面作用具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sup>[31]</sup>

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正如历史是人的历史一样，人也是历史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紧密切相关的。把人的问题，置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区别于其他人学理论的最大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重要的功能、价值和意义以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谋求全人类的解放为终极目标。同时又主张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解放理解成一种改变现实，同时在改变现实的过程中，改变自身，在创造环境的同时，完善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sup>[32]</sup>。他们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sup>[33]</sup>。“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sup>[34]</sup>。马克思主义不仅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更强调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充分肯定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人的社会实践才是改变自身的命运，求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改变人的异化状态，消除压抑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建构一个“以人为本”的公平合理的社会家园，都需要依靠伟大的社会实践来实现。这不仅是人的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是创作的源泉，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繁荣和发展的正确道路。

